文艺评论

以艺通心 展示生动立体的内蒙古

——写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之际

■张正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所谓"十年铸剑"，十年间，呼和浩特市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建设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以艺通心，坚定文化自信、站稳人民立场、勇攀文艺高峰，在首府文艺事业和文联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上，用美丽的音符，一路高歌，生动诠释了一个生动立体、砥砺前行的内蒙古。

以十年为界，呼和浩特市文艺发展的初心与梦想、向往与追求、地覆天翻的变化，清晰可见。

在沉甸甸的使命与担当面前，呼和浩特市广大文艺工作者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期待，不断探索文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用来自火热生活的艺术作品，精心打造首府各族群众文艺的"精神高地"。

内蒙古地大物博，亦地广人稀，这里居住着多个少数民族，但都分布在各个不同区域。针对这个区情，呼和浩特市的音乐家们因地制宜，走出音乐厅，到百姓家门口办"新作演唱会"，诚诚实实地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们汇报成绩！

2019年，在茫茫的大青山下，呼和浩特市音乐家协会的音乐家们，捧着新鲜出炉的新作，携手呼和浩特市文联文艺志愿小分队，一路疾驰，分头赶赴革命老区武川县、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六月的草原骄阳似火，音乐家们不顾一路舟车劳顿，下车就搭台、化妆。牧区的牧场里，农区的田间地头，老百姓们循着音乐，带着幸福的笑容，踏歌而来。艺术家们用文艺新作，传递党的声音，也为春耕夏耘的百姓送去"风调雨顺"的真挚祝福。这也是呼和浩特市文联、音乐家协会所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有益尝试。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呼和浩特市音乐家协会深感责任重大，重任在肩："育新人、兴文化"从娃娃抓起。

呼和浩特市音协连续举办了三届全市"少年之声"歌曲大赛、一届"青少年器乐大赛"，四届大赛，六七个赛道，为几千名青葱少年的音乐梦想，插上了翅膀。比赛是一种人生启迪，一场比赛，只是孩子们未来人生中的一个小小细节，但给孩子们幼小心田里埋下的，却是跳动一生的音乐种子，它将在孩子们的心里，生根、发芽。大赛是"催征号"，也是一次次的"强力激活"，在大赛的背后，有心人会领悟到，我们在"用情、用力、用心"做"育新人"工程，也会从中看到，内蒙古"首府音乐"雄起的信心和决心！赛场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身着各色民族演出服装的孩子们，从他们活泼自信的身影里，也看到了，一幅56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团圆"的美丽图景！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进一步阐明了新时代文艺"源于谁""为了谁""属于谁"的问题。

2020年，呼和浩特市音乐家协会面向社会征集呼和浩特原创城市形象歌曲。《呼和浩特我的家园》等四首歌曲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

2021年，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重点文艺作品《中国之恋》《如画的天堂》等五首歌曲获重点立项扶持。市音协副主席赵天华个人作品音乐会成功举办，市音协副主席刘武斌作品《一生跟你走》获国家奖励殊荣。这些新品力作，深情讴歌了伟大的党、讴歌了人民、讴歌了英雄，也抒发了中华儿女浓浓的爱国情怀。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就是要不忘初心，以艺通心，为新时代的奋斗者和建设者画像，为内蒙古各族人民聚集起无穷大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的本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023年，"内蒙古村歌大擂台""村歌""村晚"点亮寻常百姓的幸福人生，生活在内蒙古的各族群众，实实在在地成为了艺术的主角，过去在电视上看明星演唱会，如今，"村歌"大赛"村晚"舞台上，村民和牧民们，登上舞台，歌唱自己的生活，演绎自己的人生，那份荣耀、那份甜美、那份获得感，都浓缩在一阵阵郎朗的、憨憨的笑声中。

2024年，呼市戒毒所和赛罕区戒毒所里，歌声阵阵，掌声不断。那是"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呼市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在为戒毒所的学员们演出。艺术家们的歌声唤起了学员的心灵共鸣，动情处，学员们从小声跟唱，到激情高唱，再到情不自禁地走上台与演员合唱。学员们在歌声里醒悟人生，感受美好未来的召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憧憬未来，音乐家们的愿望是，让更多的好作品，迅速"活起来""立起来"，继续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引，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展示生动立体的内蒙古，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作者系呼和浩特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分享悦读

守望相助 梦想成真

——观歌舞剧《雕花的马鞍》

■冯永平 殷福军

近日，有幸观看了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新创歌舞剧《雕花的马鞍》，整个观剧过程不仅是感受歌舞艺术之美的过程，也是感悟历史发展、时代变化、心灵激荡的过程，深深陶醉，回味无穷，深感这是难能可贵的歌舞剧佳作。

一

歌舞剧《雕花的马鞍》是以真实发生在北疆草原上的故事为创作蓝本，并以歌曲《雕花的马鞍》为纽带，用文艺的形式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初，解放军某部骑兵八连来到祖国北疆科尔沁草原，与各族人民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建设军马场，守边戍边，强边固防，守望相助，构筑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共同谱写民族团结、军民情深的感人故事。

《雕花的马鞍》的叙事结构是其成功的关键之一。整部歌舞剧以"雕花的马鞍"为线索，由"初到草原""草原相遇""情满草原""草原烈火""守护草原"五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紧密相连，层层递进。该剧叙事结构连贯而富有张力，每一个场景都紧扣主题，每一个情节都推动以宏观历史背景为依托的剧情向前发展。同时，编剧还高明地运用了回忆、倒叙等手法，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场景和情节，将跌宕起伏的故事分为多个层次和维度，使得剧情更加丰富多彩，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感染力的故事世界。在叙事过程中，该剧还灵巧地融入了历史文化元素，通过人物的对话、舞蹈和歌唱，向观众展示了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种将叙事与历史文化相结合的方式，不仅增强了剧情的吸引力，也提升了该剧的文化内涵。在剧情节奏把握上，《雕花的马鞍》全剧节奏紧凑而不失舒缓，高潮迭起而不显突兀。通过合理的剧情安排，使得观众在欣赏歌舞表演的同时，也能够深刻感受到剧情的紧张和激动，进而展现出了北疆各族人民淳朴善良、勇敢坚韧、团结一心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对爱情、家庭和国家的深厚情感。

二

歌舞剧《雕花的马鞍》在人物塑造上做得比较成功，可圈可点。剧中，每一个角色都仿佛是从草原深处走来的真实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及相互间的交融关系都在剧情的交错迭进中，显得层次丰富，这一切不仅体现在人物的外貌和服饰上，更体现在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通过直白的对话、深情的歌唱和细腻的舞蹈动作，演员们成功地塑造了各具特色、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充分展现了戍边军人与草原儿女手牵手、心连心、军民鱼水情深的团结情谊。

其中，主要人物徐振中和乌兰，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和深刻的内心世界。作为一名戍边战士，徐振中机智勇敢又争强好胜，他爱上了乌兰，为了守护她和草原的和平与边防的安全，他青春无悔，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乌兰美丽纯真、热情奔放、性格泼辣、敢爱敢恨，她深爱着徐振中，愿意为他付出一切。两个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和成长历程，构成了全剧的重要内容。

除了主要人物之外，该剧还成功地塑造了善良坚强、深情守望的英雄额吉萨仁，正直干练、多才多艺的嘎查书记孟根仓，乌兰的父亲阿拉坦仓，军马场连长姜建军以及牧民、战士等众多生动鲜活的配角形象。这些配角虽然戏份不是很多，但都在剧情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全剧增色添彩。值得一提的是，剧中还塑造了一个阳光上进、喜欢女主人公、不时搞点恶作剧的年轻人物巴拉，使剧情显得更加丰满，又带有几分诙谐幽默。

该剧最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将徐振中等人塑造成无惧无畏的钢铁英雄，而是通过环境的营造、乌兰与巴拉在徐振中等人牺牲多年后的痛苦回忆等细节呈现，将徐振中等人物形象多角度立体合理呈现，使得人物形象真实可信，亲切感人，深入人心，从而激发了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加深了该剧的审美表现力。

三

歌舞剧《雕花的马鞍》中的歌舞语言是其艺术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吸引观众眼球的亮点之一。在舞蹈方面，演员们在舞台上通过挪、移、腾、跃、旋、卧、扑、跺等丰富的肢体动作和喜、怒、哀、乐、悲、恐、惊等的面部表情，将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好来宝、长调等方面，演员们嗓音清亮悦耳，节拍明快，感情真挚充满激情。他们通过歌声将人物的内心情感传递给了观众，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角色的性格和命运。剧中歌舞语言既是具象生动的情感表达，又是引发观众联想的意向提示，其巧妙地结合了剧情和场景，并与之相辅相成。这种歌舞语言的丰盛与生动，不仅增强了歌舞剧《雕花的马鞍》的艺术表现力，让舞台画面有了油画的质感，也提升了观众的观赏体验。

同时，剧中的音乐也值得赞叹，可以说与剧情对接得严丝合缝，相得益彰，激越时就像时光在叩问，让人血脉贲张，柔和时又令人心旷神怡，让观众在欣赏歌舞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音乐所带来的美感和情感交响。此外，舞美灯光也用得较好，特别是救火场景、男女主人公阴阳两界相隔对视场景中，背景与电子屏信息量大，呼应了舞台。

正是在舞美、灯光、色彩等手段良好综合运用下，《雕花的马鞍》全剧有限的舞台叙事空间被无限扩大，从而增强了整部剧的舞台视觉效果，以及情感表达的蓄积力，使得《雕花的马鞍》在视觉和听觉上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当结尾《雕花的马鞍》歌声再一次唱响时，观众与该剧产生了情感共鸣的高潮，歌舞艺术所特有的具象表达方式得以充分地显现，一种难以言表的激情，在《雕花的马鞍》整体与局部完美的结合中，蓬勃燃放！

四

在歌舞剧《雕花的马鞍》中，文化符号的意象构建是该剧艺术魅力的核心所在。首先，剧名"雕花的马鞍"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它不仅是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更代表着游牧民族的勇敢、坚韧和追求自由的精神。在"雕花的马鞍"里，有历史的回声，有生命的绝唱，更有时代的强音。

如今，军马场已成光荣的历史，"雕花的马鞍"历经岁月的洗礼，成为了科尔沁草原英雄荣誉的象征，成为了祖国北疆军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团结一心、戍边护边的历史见证，也成为了内蒙古各民族打造、推广、共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更成为了北疆军民倾情北疆、奉献北疆、建设北疆情怀和精神的传承。

此外，《雕花的马鞍》剧中还精巧地运用了其他文化符号，如服饰、歌舞、乐器等，这些符号的优美搭配运用，不仅丰裕了剧目的表现形式，也增强了观众对北疆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这些文化符号的意象构建，歌舞剧《雕花的马鞍》成功地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相融合，营造出了一种浓郁的多元化民族风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交融的艺术风格。这不仅彰显了北疆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魅力，呈现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勇敢、坚韧和团结精神，同时也传递了富有哲学意蕴的深刻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当今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时代机遇下，歌舞剧作为一种融合了音乐、舞蹈、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艺术体裁，其创新与发展尤为引人关注。歌舞剧《雕花的马鞍》从耳熟能详的歌曲缘起，"跨越"到用全新的视角，以"歌舞"精辟呈现难忘历史的过程，这是在用另一种有声、有形、有感的文艺形式传播精神文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也是在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民间艺术遗产，推进北疆文化建设，打造北疆文化品牌。这种"跨越"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价值的创新，更是北疆文化"两创"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而且《雕花的马鞍》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主题内涵，在创新的追求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的、极佳的范例。可以说，作为内蒙古自治区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扶持剧目和自治区优秀剧本孵化计划入选作品，《雕花的马鞍》的这种接地气的创新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和升华的机会，也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雕花的马鞍》总导演、内蒙古乌兰牧骑学会会长那顺说："把《雕花的马鞍》以舞台剧的形式呈现给观众，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

如今梦想已成真！

（作者冯永平系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秘书长、研究员，殷福军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教授）

书文评点

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大后山》的口述史价值以及其他

■马明奎

（一）

《大后山》作者刘玉昌（笔名刘洋）与我同乡，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大后山传统文化研究，并且成立民间研究团体，出版系列专业丛书，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儿，这点真不容易。

通读这部长达百万字的书卷后，第一感觉是该书真实地还原了大后山地域百余年的历史，可谓是佐证地方志的一部民间史。其讲述人正是作者的父亲，小的时候我对他多有耳闻：二号地有个干部叫刘永胜，他是从我们偏远山区走出去，端上公家饭碗的人，为我景仰的前辈。我印象中，似乎见过这位乡村干部，下乡时骑一辆破旧自行车，村里开大会，几百号村民黑压压一片，他说话声音洪亮，好像麦克风扩了音。

读这部书方知：我的恩师徐煜与刘永胜是同学，刘永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后山一带最早的公办教员。当年，徐老师与刘永胜一起投身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响当当的新青年。由此，我在读这部书时，便有一种来自于家乡的天然亲近感。可以说，《大后山》是由父亲口述、儿子记录，然后编撰成书的。于是，从文学评论的角度讲，这里略说一二。

首先，这些语料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呢，还是该地区的历史文献资料呢？如果是前者，书中出现了许多真名真姓的人物，来不得半点虚构；如果是后者，口述只具有田野作业的人类学价值，还不能简单当作史料。第二，本书封面上标记是纪实文学，这其实是一个吊诡。多年来，我已不再读以文学为标签的作品，因为自新时期纪实小说张扬以来，此类文学太多了，一会儿叫原生态，一会儿叫纪实性，还有的强调在场性，汇入先锋派的那一路甚至没有标点，连话说得都不够格。《大后山》显然不入此流，那么，就只好从实情这一维度来读。第三，我是把它作传记来读的，传记是要经得住历史考据的：真实性，历史感，客观化是三个硬指标。真实性不会有问题，历史感也不会出问题，客观化就比较难：不是从个人好恶出发，一己拘狭，独出心眼。而是要总揽全局，顾及具体，公正评价。全局是什么概念？本书的全局是从清末民初到改革开放，这个时间跨度能够承载多少历史变迁呵！还包括空间：从山西到内蒙古，从清水河县，再到大后山。还包括社会、世道、人心；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初，大后山地区的社会变迁、生产生活。而贯穿几个层面的核心线索就是刘永胜从孩提时代独闯大后山到青年时代发家致富，再到当干部、成家立业，与周边亲戚朋友往来，直至退休还家这样一个充满艰辛又无怨无愧的人生历程。换言之，刘永胜既作为一条叙述主线牵引着全书的建构，也作为一个确定的视角映照出一代人、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历程，他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如何从艰难困厄中挣扎出来，走向今天的幸福安康。第四，我在《大后山》里没有发现一个坏人和恶人，当然难免个别小人。我感觉还不是为了避免文本之外的麻烦，而是心性照宇，光明铺地，大千世界，无非良善。文本表现人物颇似古人：隐恶扬善，中允而论。由于作者写的是真人，知根知底的就可能深知其人详知某事，譬如，某人在历次事件中手段残忍表现极坏，有许多劣迹，但是他的笔下，那些可以忽略或别出歧解的劣迹被隐去了，只留下中性的甚或微善的方面。这就叫人品。那么，这是不是客观化呢？许多朋友也许并不懂得：评人论事虽亦求实，但更看重评论者的心性和气度。古人有知人论世之说。所以我理解为，即在客观叙事的过程中，对于具体的人或事，其价值主导是善意的和优雅化的，并不苛酷于真实度，重在价值导向从而关照视点的可控性偏移。所谓知人论世讲的是知其人而论其世，亦即给人留有一定价值空间，通俗地讲就是给人留一点余地。古人讲，规过避私室，扬善到公堂。行文论事，对于社会和世间的一切，其实都是一样的。

《大后山》整个文本有一种浓郁凝重的历史感，叙述开阖有度，舒卷自如，笔势浩荡而雄浑，人物跃然生动。但是有一点，无论评骘时事，还是臧否人物，都没有随大流、说假话，而是真人真事，据实写来，既不隐恶，也不溢美，从各色作略中披沥出每一种人品，最后归根于善性。说到底，政策承载的是天道，落实和执行还是要看人的心性和品行，这就是看他如何理解政策。我再一次举这个例子：上世纪四十年代，当村里分浮财时，刘永胜时任农会保管员，他没有通天本领，不能改变任何状态，但是没有忘恩负义：他是逮着空给财主婆送回去一匹从她家搜出来的绸缎，这不是经济支持，而是心理支援。他让这位老婆婆知道：这个世界还没有禁绝人心和温暖，虽然它已非常昂贵。这就叫顾及具体；换言之，刘永胜之所以敢这么做，感恩之外还有另一层分析：这位老婆婆是个好人。与那些趁人之危、落井下石、见利忘义的小人和恶人比，刘永胜的确有着常人难能的善心和德行。

（二）

可见，口述史也并不就是民间性，举凡人进入的创作或编辑都会代入价值导向和主体评价，真正的民间恰恰不是如学者所理解的田野的固化性和质实性，相反，其根源性和本真性在于心性和品行，就是相对于纯客观性的天理良知。而我们阅读《大后山》就会有三分对于作者的信赖，这是对人最起码的尊重。这使我想起中国小说的传统理念。一百二十多万字《大后山》可谓长篇巨制，步入今天的文学殿堂也无疑问，但口述性质大大增加了其史实价值和文献意义。从文本看，与其它同类作品不同的地方是：它以大时代和大地域的概观勾勒出了那一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全貌，其波澜壮阔之势我们用狂欢化来概括。狂欢化不能理解为专写狂欢，如巴赫金那样完全进入民间民俗的文化分析。是区别于西式的线性逻辑结构和人物典型化叙事，以散点透视和立体多维来宏大叙事，"框内"人物与画外读者是互动且能沟通的。整体看是涵泳万象包容生动，人物应运而至，事件波回浪叠。核心人物是其核心，但不是总纲，而只是一条经线，全篇网面还是以事件的滚动来缔结的。在社会这个大网面里，人如潮，事如织，汹涌而来，奔竞而去，巨细无遮，行云流水。比如，《大后山》写到刘永胜的第一次婚姻：杨家因弟兄俩分家触了霉头，全家人暴亡，只剩一女，乃娶为妻。建国伊始，事杂人众，两人情性不合闹了饥荒，杨女回到爷爷家。此去竟未返还，死于疾病。这是一个苦尽头的女子，其命运与旧中国大多数女子一样，令人唏嘘，恕不赘论。我只从文本讲，此系叙述之边末，是狂欢化题材运动中的一脉支流，完全可以忽略。但是作者把她记写下来——我们知道，狂欢式生态文本的显著特征就是于散文化叙事中突出或插入令人心警的启示或训诫。大后山秧歌车灯表演进入狂欢化时，会有一个突然的停滞或陷入：要么道路遇到险阻，要么车子陷入泥沟，全心齐力，团结奋进，把狂欢变成紧张，把紧张变成玩弄，把玩弄变成庄严，从而回归本体性。理解至此，我们就注意到《大后山》随处点缀和镶嵌的那些民俗知识：关于狼，关于仪典，关于生死……这些唯独属于大后山特定时间节点的事象和风情，构成狂欢化文本，是真正的生命原生态。其价值不在于技艺，而在于人存活于斯时斯世对于地理、对于宿命的领承和体认。狂欢化的另一特点是多声部：与本体同一性相悖，多声部强调作者以及叙事单元的相互拒斥和张力结构。每个个体都是一个世界，每个世界都是一种不可重复的个体性涌现，但相互之间又互文涵化，不是分裂或割离。狂欢的本质是解放与警觉抻张的价值幅度，一个从时空绵延着生长和破解的生命场域。该段落叙事并不是边枝末叶可有可无，而是"散文化叙事中突出或插入令人心警的启示或训诫"。那种无可言诉的悲凉和怜惜是关于良心和善意的自觉。本书似乎在告诫读者：哪怕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旧时代有缺陷的女子，她仍然在拷问着我们的良知：对于她，我们公正吗？我们有过善意的理解和深挚的体贴吗？她的去世并不影响叙述的整体脉络，但是作为一个插曲，她构成整体叙事的泛音或杂质，是天地人生间永远不会逝去的忧伤和痛楚：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生命，一个可能并不邪恶且有大悲的可怜女子。生命生长是自然的和解放的；破解邪恶就是警觉的和灵感的。当解放与灵感、警觉与自然在一个时空同一性生命场域涵化共在，生命就以嗑噬相应的方式破解而生长了。杨女在后面的历史叙述中再无余响，但从潜意识看，她构成刘永胜一辈子的遗憾，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忽略。其后的生命中，他格外警觉和细心，对于危难者倍加关怀和体谅。他绝不伤人，尤其不能不顾他人的死活。这与那些骄狂得志的歹人不可同日而语。

这使我再一次想起徐煜老师，后来他学了中医，更直接地医世救人了。其晚年景况良好，这叫做善有善报。古人又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人的朋友就是他人格和人品的注脚。徐老师作为刘永胜的好友，是我在数十年后，再度理解童年、理解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导向，也是精神指航。这使我理解了：深透世情者智，了悟天道者慧，修积下德性了，故尔近乎圣。

（作者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州师范学院教授，本文收录于作者国家级研究课题《生态叙事的本体性研究》一书）

本版编辑：甘永康 张文静 美编：辛杰